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借助党的报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,打好打胜宣传战。80多年前,在抗战最困难最严峻时期,山西东忻县(今忻州市忻府区)县委创办的《边哨报》以文字当血肉,用笔墨作刀枪,成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敌顽开展斗争的有力舆论工具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。

1939年10月,晋察冀边区二地委派郭高岗同志到忻县任工委书记。区一级的党、政、群等机构虽已建立,但很不健全,全县党员只有60多人。村政权除肖家山、武家山和南山深处一些小村庄完全由我方控制外,日伪军占领了大部分村庄,但整个平川地区中间地带很大,群众中蕴藏着极高的抗日热情。日寇占据忻县城,并在同蒲铁路沿线的忻口、播明、豆罗、平社、北义井等地设立了据点,敌人一方面集中兵力保护其据点和交通线,一方面对我县委机关和武家山周边一带进行频繁“扫荡”,对我平川地区进行骚扰袭击,斗争形势异常残酷。

县委根据斗争形势,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,积极领导全县党政军民,加强建立党组织,抗日武装,积极开展抗日斗争,巩固我方控制的村庄,不断向前推进,逐步控制中间地带,缩小敌伪统治区。同时,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,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40年春,县委成立了县基干游击大队,主动出击,打击敌人,护送地方干部,到夏天,基干游击大队发展到100多人。

在对敌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,整个晋东北的抗战局面有了大幅好转。1940年夏天,地委和定襄中心县委陆续派来一批干部,充实了党、政、群团体,全县党员发展到140多人,有20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,据此,地委决定将县委改为县委,区、村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。由于斗争的需要,亟须有一个动员群众、组织群众参加抗日的宣传工具。县委成立后,县委书记郭高岗同志说,东忻县是晋察冀边区的前哨,就办张《边哨报》吧,作为掩护县委的工作机构。同时决定以县委秘书李平为主,编印这份报纸。

万事开头难。敌人对我边区经济封锁十分严密,油墨、纸张非常紧缺,最困难的是没有油印机。县委事务秘书郭养宜通过各方面的关系,想办法从敌占区买回一部油印机,又通过关系买回了一些油墨和纸张。李平从有洋戏匣子的人家里要了几个唱机上用过的针头,插在高粱秆箭筒上,用线绑紧,做成了铁笔。1940年5月,第一张《边哨报》在今归村董成怀家的耳房里诞生了。从此,县委的同志有了掩护,群众都知道李平他们几个是报社的。

《边哨报》的报头由郭高岗书写,为了醒目,用红油墨印刷。报纸八开大,每隔7至10天出一期,只发到各区、村党支部。报道内容主要是配合斗争形势和上级党委的中心工作,指导对敌斗争。同时,也及时报道我基干游击大队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消息,报道送公粮、做军鞋、合理负担的模范事迹,还揭露敌人的烧、杀、掠、抢丑恶行径。县委书记郭高岗、宣传部长陈苏人亲自写稿,报纸办得生动活泼,喜闻乐见。

东忻县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,开展游击战比较困难,《边哨报》就发表了《保留青纱帐,战胜小日本》的评论,号召群众秋收后,一定要留下青纱帐,为了开展游击战,更好地打击敌人。1941年春,基干游击大队队长赵先荣同志在破坏敌人交通后,在麻会一带与敌人遭遇,不幸光荣牺牲。县委在《边哨报》上刊登了赵先荣同志的模范事迹,号召全县党员群众向赵先荣同志学习。县委书记郭高岗写了挽联,刊登在报纸上:“胸怀正义干革命,为民族先死;足踏血迹上战场,而光荣殉国。”“将眼泪咽下胸膛,向烈士致敬;用枪弹杀尽敌寇,为死者报仇。”

这张报纸发出后,党员群众争相传阅,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抗战的信心和斗志。编辑人员还根据妇女识字不多的情况编写了妇女识字课本,刊登在报纸上,又油印成小册子。有句话广为流传:“不擦油,不抹粉,省下银钱打日本。”斗争是残酷的,办报也十分艰难。敌人经常“扫荡”,同时包围几个村子。办报的同志把油印机装在麻袋里,放在老乡的柴草堆里,先把蜡板刻好,纸裁好,争时间抢速度油印好,再把机器收拾好藏进柴草堆里。为了安全起见,睡觉时都单独行动,互不知晓,以免出了问题,损失惨重。1941年8月,李平刚在令归村刻完新一期报纸,天快亮时,忽然听到枪响,大家翻墙跳到另一条巷子里,一群日本鬼子正埋伏在那里,无奈之下,他们只好拐进一户百姓家。素不相识的大嫂用手指指柴草,大家跳进柴草,大嫂用高粱秆和杂物盖住窗口。郑中和同志年纪大,跑得急,按捺不住咳嗽起来,大嫂家十三四岁的儿子使劲儿扭揪妹妹的屁股,小妹妹的哭声掩盖了窗里的咳嗽声。敌人穷凶极恶地打那位大嫂,把胳膊都打断了,但坚强的大嫂一个字也没说。



古往今来钟楼街

王继祖

编者按 钟楼街是太原市历史悠久的繁华街市,与柳巷、桥头街、柳巷南路,成“十”字街连,是太原百余年来商品集散中心。从2020年4月开始,钟楼街片区迎来了大规模提质改造,并将于本月中下旬喜迎八方来客。这条见证太原府城商业发展的钟楼街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,让我们跟随王继祖先生的笔触,一览千年。

钟楼街,是太原繁华闹市区的一条商业小街,长不足六百米,宽仅十二三米余。街两侧小商铺、大商市,鳞次栉比,熙熙攘攘,游人如鲫。古谚“街宽不成市”,在此,钟楼街给予最好的应验和诠释。

钟楼街的街史,是怎么引起太原人的兴趣的呢?原因可能很多,但更主要的触发点,则是这次对钟楼街的提质改造工程。钟楼街改造不是一次了,从街名的整合、街巷的合并,到步行街的改建等。客观地说,每次改造虽然步子不是很大,力度不是很强,但都是一次促进。这次钟楼街的提质改建,与过往的改造,真的是难以同日而语,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或许有些夸张,但是,说其旧貌将变新颜,或巨大如故,却似乎又有些力度欠缺。

太原人对钟楼街的情感太深了,深得难以用语言表述,深得难以名状。有一位土著学者,他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太原,耳濡目染,研究探索,毕其一生倾注于家乡的历史与文化,他对自己对钟楼街的认识、感悟、研究心得,把钟楼街概括为两句话:一句是“一条街,一千年”;一句是“一条街钟楼街,半部府城史”。何谓“府城”?简单些说就是宋潘美建的、明谢成扩展的千年太原城。因为,千年以来行政建置为“太原府”,故谓之“府城”。

钟楼街果真有一千年吗?整个太原的建城史是两千五百年,它就有一千年?靠实不靠实?回答是肯定的:“不仅靠实,而且掷地有声!”

太原的建城史早已确定(见《太原日报》2002年12月27日“周末”和《中国城市经济·太原建城2500年专辑》刊载的《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》):从春秋末季,赵简子建晋阳古城于公元前497年,到本世纪的第三个年头,公元2003年,太原市举行“建城两千五百年”城庆活动,整整两千五百年,一年不多,一年不少。这座当年的赵国初都,北魏之“霸府”,东魏、北齐陪都,后来的盛唐北都,再后来的北汉国都,在太原的大地上存在和发展了1476个春秋。非常可惜,可惜到令人扼腕,它最后毁之于宋灭北汉的历史巨变中,被胜利者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“火烧水淹”夷为废墟。这一年是宋太平兴国四年,公元979年。太原建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,就此翻过了沉重的一页。

古城被毁后的第三年,太平兴国七年,公元982年,宋将潘美在被毁古城东北30多华里的唐代军镇“唐明镇”,又建起了一座古城。这座城初起叫“宋太原城”;未几,并州州治由榆次迁来,史称其城为“并州太原城”;再后来,革除

并州之置升置为太原府,又被称为“太原府城”。自此以后,太原府城历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五个朝代,一直是太原府(路)的治所,所以习称“府城”。因被毁的“晋阳城”习称“古城”,所以“府城”也习称为“老城”。

我们的钟楼街,就是在宋太平兴国七年,潘美建成“宋太原城”时,与这座“老城”一起诞生,同时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不过当时它的名字还不叫钟楼街,而是叫做“东门正街”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?因为宋太原城,辟建四座城门,城中还套有一座“城中城”子城,这条街西衔子城东城垣,东通宋太原城东门“朝曦门”,是东出太原城的唯一大街,所以,以方位和功用,得名“东门正街”。为什么不叫“东门街”,而要叫“东门正街”呢?因为中国古代宋以前的城市(池),城中的建筑,为“坊间”格局。直通城门的官家御用通道,称“官街”“正街”“大街”;坊间间的通道称“坊街”“坊巷”“里”。这便是“东门正街”,之所以称名“正街”而不是称“街”的原因。

宋太原城和城之东门正街,一经问世,历宋、金、元三代,虽每经战火之创,但城池没有盈缩,东门正街几无变化。城中子城在宋金宣和“太原保卫战”时受到了重创,子城西城垣坍塌,形成后来的“半坡街”,再后来的“半坡西街”。城中的坊间结构,大约就是在这次“宣和之战”中,大部被摧毁的。

讲历史,说变迁,应该是史说,似乎不应该话说是话。我们说东门正街经宋、金、元三代,380余年而无大变化,是专指街址及长短宽窄无大变化,因为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》的“城池”部分,在记载太原宋城的街坊名称时是这样说的:“宋坊名,东门正街,北第一寿宁坊,南第一迎福坊;北第二聚贤坊,南第二金相坊……”这则史料,确证了东门正街有多个坊,街北侧第一个坊名字叫做“寿宁坊”。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》的“寺观”又云:“寿宁广化院,在府东门正街北第一寿宁坊。”这则史料,确证了寿宁坊中建有佛门寺院寿宁寺。万历《太原府志·古迹》,又载:“寿宁寺,察院西,宋大中祥符年建,有真宗御制碑,字多剥落,俗呼打钟寺。”这则史料,又明确告诉我们,寿宁坊中的寿宁寺,有宋真宗御制碑,它是在寿宁坊建成之后,才建起来的,因坊名而得名。它的俗名叫做打钟寺。

这些史料贯穿起来,向我们揭示,坐落在东门正街西口北侧的寿宁坊,坊中的寿宁寺,就是东门正街西端的地标性建筑,从宋初一直到明代的万历年间,这个寺庙一直存在,寺中还有宋代第三位皇帝宋真宗的御制碑石。而且,寿宁寺的俗名就叫“打钟寺”,就如永祿寺的俗名叫双塔寺一样。如是,铁一样的事实,向世人昭示:从宋初到明中叶寿宁坊随着时代的变迁,由坊变成了街巷,但寿宁寺却一仍其故,传承了下来。

至于东门正街东端终点朝曦门,宋、金、元三代,城未修葺城门依然。一直到明初扩城,朝曦门拆除,建为“桥头街”。圈入城中,但其护城河桥,依然存在,依然是东门正街的东终端,如此而已。

明代扩城时,在东门正街的西端北侧,即打钟寺西,新

建了“十字歇山顶”“下有台基,上筑三层”的大钟楼。钟楼秀丽观美,成为东门正街上的新地标,于是,东门正街这条有着近400个春秋,纵跨宋、金、元三代和明初洪武十个年头的历史街名被“钟楼街”取而代之,街虽如故,名却更新。

明王朝从洪武元年的公元1368年,到崇祯十七年的公元1644年,共存在了276年。清王朝从顺治元年的公元1644年入关,到宣统三年的公元1911年,共维持了267年。钟楼街在明清两朝的540余年中,西起于打钟寺西,东至于桥头街西端,街之长短,街之宽窄,几乎未变。但是,街之两侧却是:寺庙变成了商市,民居变成了商号、衙门。尤其是明末的李自成农民军,攻掠太原府城,火烧大南关商市,有明一代,“蔽天光,发地脉”的古城商家聚集之地“大南关”城,辉煌不再,商家遂渐沿着大南门街北上。向城中渗透,由南而北,东西两侧,马市出现了,产生了马市街;马市由商铺取代了,产生了南市街;牛市出现了,产生了活牛市街;米市出现了,产生了东米市街、西米市街;羊市出现了,产生了东羊市街;驴市出现了,产生了西驴市街。太原府城中的商市越来越发达,一直向太原府衙门蔓延过去,和城中早有的商家、商铺,融合于一。

衙门毕竟是衙门,官府也在集群而聚。太原府衙向西是阳曲县衙,向东是山西巡抚衙,再东是布政司衙。再东还是衙门……灵活的商家总是与官家有些忌讳,遂转过头来向钟楼街、向柳巷、向桥头街……于是,在明、清交替之际,在晋商发展的拥簇下,钟楼街由西而东,成为太原城中商市的中心,成为城中后来“百年商市”的汇聚点。千年古街华丽转身,又成“百年商市”,为明清两代,尤其是清以来太原商业的发展,挥舞起神来之笔。清道光之后,到民国中叶,钟楼街商市发展进入疯狂阶段,如果没有八年沦于日本侵略的苦难时期,如果没有三年民国行将告灭的惨淡经营时期,太原的钟楼街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年代。

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,促成了太原的风凰涅槃,唤醒了钟楼街的新生;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,为钟楼街的发展插上了翅膀,装上了推进器。这条古老的、曾经的东门正街,如今的钟楼街,终于在改革大潮初起的公元1982年,迎来它的千岁华诞。“一条街,一千年”,这不是一段演义,也不是一个戏说,用太原人的俗语讲,是“碌碌碌碌盘——石(实)打石(实)”的真事。

太原有着两千五百年的建城史,崛起于宋初太平兴国七年的宋太原城,迄今也有1038个年头,我们的钟楼街与这座古城同呼吸,共命运,有着同样的年华。一千多年来古城千变万化,钟楼街也与之千变万化,共同经历了坎坷,共同奔走了艰难,共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,共同迎来了共和国的蒸蒸日上和欣欣向荣。

唯一没有变的,亦或说几乎没有变的,就是其街的西起东至,长短几近未变;就是其街的南北宽窄,几近没有变。“一条街钟楼街,半部府城史”,就是一句最写实,又最写意的钟楼街形象史。这一点无论是成都的“宽街窄巷”,还是福州的“三坊七巷”,都难以比肩。

(压题图片为即将竣工的钟楼街 作者:西江月)

鲜为人知的云雕技艺

刘勇



新绛有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——云雕,是一种雕漆工艺,旧称剔犀,元明时盛极一时,目前在国内外只有新绛一地留存。云雕的做法是在胎型上以不同颜色的漆层层堆起,

然后剔刻出回旋生动、流转自如的图案花纹,不同颜色的漆层从刀口暴露出来,花纹中最常见的是云纹,于是就称为“云雕”。

新绛云雕的特色体现在刷漆:首先在做好的案桌、提盒这些器具的实木坯上,用红、黑两种颜色的天然漆层层相间涂刷,一般要涂刷70到80层,多的有上百层,约六七毫米厚,叫“髹涂”。为避免漆层干裂,刷漆须在阴房里操作,室温在20摄氏度左右,所以很多工厂的刷漆工序都是在半地下室里完成的。

待木器上的全部漆层凝固变干后,再用刀在上面剔刻出云纹图案。剔刻的斜刀深约五毫米,刀口上宽下窄,雕刻后显露出颜色和层次的花纹如彩云一般美丽。

刷漆和雕刻决定了云雕漆器品质的优劣。按照一天只能上一层漆计算,上百道漆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。成品的大漆云雕件从下单到交货通常要一年左右。但因云雕漆器十分耐腐、越用越亮,很多客户宁愿等也想求得一件云雕作品。

糝糝饭

郝妙海

上期的《钱钱饭》(9月1日《太原日报》第7版),讲的是一种用玉米粒制成的家乡美食,刊发后即有文友联系说:“钱钱饭,在我们赤桥村(同属晋祠镇)叫‘糝糝饭’……”其实钱钱饭和糝糝饭并不是一码事,钱钱饭类似于拨烂子,而糝糝饭则类似于稀饭(当地叫稀粥),做法、吃法均不相同。

糝糝饭在方言中近乎“湿”与“湿”之间的发音,指干玉米粒经炒制后碾开的碎末。炒玉米粒,乡里人即叫“炒糝糝”。记忆中,炒糝糝一般都在晚饭后的空隙进行。母亲将炒糝糝的耳朵儿坐到火上,待耳朵儿烧红后,在里面放一层干净的细沙,用一束玉菱箭筒来回拨拉,使沙子均匀受热。沙子灼热时放入玉米粒继续拨拉,到玉米粒中的水分大部焙出,焦黄半熟并泛出阵阵香气时,即可用铜篱筛捞。将沙子筛到筛中,玉米则倒入筐箩或簸箕中,接着再炒第二拨。那时一见母亲炒糝糝,我便守着火炕(灶台)不走,因为炒到最后,母亲总会留一些玉米粒继续炒到爆裂开花,分给我和妹妹们吃。

我家老宅大门外的榆树下有一盘石碾子,母亲在炒糝糝时,就会嘱咐我将一把扫炕笤帚放到门口的碾子

上。村里头约定俗成,放笤帚意味着有人将碾子占住了,便不会有人来争抢。次日黎明我家就能第一个碾糝糝了。

碾糝糝,在家乡话中叫“刺糝糝”。因为玉米粒炒过后极易碾碎,而糝糝又不用过箩,碾成细小颗粒即可。一簸箕糝糝,大约半小时即可碾完。

糝糝饭和小米稀饭做法一样,但远比小米稀饭喝着香,而玉米也比谷子产量高,这“糝糝饭”便一辈辈传下来了。那时,农闲季节庄户人早晚就喝糝糝饭充饥,最多在里面积少几个玉菱面煮疙瘩。农忙季节,则在糝糝饭之外另蒸些窝窝头,或炖些拨烂子做添精。秋季,若在糝糝饭中熬些南瓜或萝卜就更香甜了。而在我家,只要蔓菁一收,糝糝饭中就多是熬蔓菁了。因那稍有点怪怪的药香味我特别喜欢,以至全家人因了我的原因,一冬天就喝熬了蔓菁的糝糝饭了。大冷天,若再切一碟蔓菁疙瘩菜,拌上少许红辣椒,一碗糝糝饭下肚,便满头大汗,口舌生香了!

现在很少有人知道“糝糝”为何物了,但在那个年代,糝糝饭也算是我们果腹的美食之一了。

晋之味

“作伺”一词在晋源一带谈作“扎刺”。尽管谈作“扎刺”,但与我们常说的手指或某个部位扎了根刺,没有任何关系。“作伺”一词有“等待”“等候”及“伺候”等含义。

过去通信技术落后,甲乙两人提前约好时间相见,可待次日乙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甲的影子,抱怨:“说好前晌就来,你看,快晌午也没个人影,让人一直‘作伺’着!”这里说的“作伺”主要指的就是“等待”或“等候”。

在交通相对落后的山区,耕田多在村周山坡岭上,农民出工全靠步行,有的甚至要翻山越岭,加之没有钟表计时,回家吃饭更没个钟点。为了让儿子能吃上热乎饭,母亲要提前和好面,捅火锅,并不时走出家门张望等待儿子归来。这个过程也是“作伺”。与前面不同的是这里说的“作伺”,除了“等待”外还多了“伺候”的义项。“作伺”是一件相当熬磨人的事情。有因记性差或临时有事等原因,早将相约之事抛到脑后,让等候者从热情洋溢、满怀期待,渐渐过渡到坐卧不安、心烦意乱,直至望眼欲穿、失望抱怨。

一段时期,分下的粮食往往不够吃,需要将家中的细粮换成粗粮。于是李、赵二人骑车远赴南面产粮多的县份换粮。进入某村,二人分头行动,并商量好会合的大致时间及地点。李用100斤大米换了200多斤高粱、玉米,正愁回家一路的艰辛,恰好碰见邻村的卡车。容不得多想,李连货带自行车扔上去,乘卡车而归。赵来到相约地点,左等右等不见李的踪影,眼看天色渐晚,只好找了粉巷,在电线杆上给李写下留言悻悻而归。这件事情,赵在等候李时尽管心急如焚,但似乎不能用“作伺”一词。因两人事先没有约定谁等待谁,故顶多算李“失约”,导致赵苦苦等候。

而今,家中成员之间出均有行踪,且真正做到“游必有方”“君问归期应有期”;至于同事、同学及亲朋好友相约,除提前协商好时间地点外,临出门时一般均要再挂个电话或发个微信短信,告知相聚的准确时间,即便临时取消,也能在第一时间告知对方,再不用着急上火了。

晋方言

也说「作伺」

殷安